



平城之殇

——《大同》之二十

侯建臣

北方之北，还有北方。所有的地域概念，都不是绝对的。所以，北魏统一北方，只是个狭义的北方概念。在北魏之北，依然有着一群或者若干群有血有肉的族群，活跃在他们的东南西北，驰骋在他们的马蹄能到达的地方。

比如柔然。柔然原本是鲜卑族的一支，在五世纪至六世纪，在蒙古高原上过着较为原始的游牧生活。强盛时期，柔然的疆域北到贝加尔湖畔，南到阴山，东北到达大兴安岭，西部与准噶尔盆地相接，还曾到过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。早期，柔然每年要向北魏进贡牲畜和名贵的动物皮毛。公元402年，柔然汗国正式建立，前后共经历了19位君王。柔然在蒙古高原上征战了150多年，时不时驱策快马，挥鞭长鞭，骚扰北魏边境地区，掠夺一些人，抢夺一些物品，给北魏朝廷制造一些不会太大却也十分头疼的麻烦。

因为行无定踪，居无定所，小部队找不到，大部队不值得，若干年了，一个个似乎还算强大的族群，比如大夏、西凉、北凉、北燕等，都被拓跋之魏灭了，而这柔然却一直顽强地存在着。如窜动的虫子，像奔走的蚂蚁，似憎恨其顽固，又对其极其不屑，北魏上下，便把其称为“蠕蠕”。为了对付柔然，光太武帝拓跋焘就组织了十几次对柔战争。公元429年，拓跋焘亲率大军深入大漠三千里，大破柔然，俘虏柔然部众三十余万人，战马百万匹。虽然柔然受到重创，但依然顽强地存在着，时而散居各地，时而集合南犯。据说，流传至今的《木兰辞》写的就是北魏与柔然的战争。

蠕蠕不灭，北方难宁。北魏灭掉若干个强大的敌人之后，为了稳固边防，护佑平城，在院落落的北边，设立了北方六镇。作为重要的边塞军事组织，设立之初，北魏朝廷对北方六镇非常重视，边镇军官享有较高的特权，将领全由鲜卑贵族、凉州武人担任，戍防的军人主要是鲜卑人，也有来自中原有权有势人家的子弟。

正如民间那句俗话“风水轮流转，明天到我家”，到不到“我”家不一定，肯定不会永远在“你”家。当北魏的政治中心南迁，旧都平城的地位不再重要，北方六镇官兵的待遇就慢慢边缘化了，就像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。随着政治地位的降低，粮饷紧缺、收入锐减等问题也随之而来。

北魏的火药桶终于被愤怒点燃。523年，柔然又一次驱马南下，直逼北魏边境。怀荒镇民众请求镇将开仓放粮，以便抗敌，遭到了拒绝。愤怒的兵一拥而起，杀死镇将，举行起义。第二年3月，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起义。4月，高平镇胡琛起义。6月，秦州莫折大提起义。随之，其他各镇纷纷响应，起义之火燃遍北地。

当年的六镇，就是北魏为抵御其北的柔然等敌，保护平城安全而设。六镇之民起义，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这平城。当浩浩荡荡的起义兵士一拥南下，一直还算相对平静的平城，定然会遭受重创。虽然不再是都城，风光与气派大不如前，但作为旧都，平城不仅住着不少北魏皇室的遗老亲贵，且保存着当年不少遗迹。这些特殊的人、特殊的物，成了起义将士发泄不满的目标和对象。

在北方六镇起义的激励下，526年，敕勒部在恒州桑干县起事，被北魏尔朱荣带兵大败；鲜于阿胡在朔州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）起事，先占领朔州城，后又攻下平城，驻守平城的北魏镇将弃城而逃。起义的将领，大致是为了攻城拔地，扩大地盘，壮大实力，在新的变局中谋取更大的利益；野心大的，则想在乱世中成就梦想，建立自己的王朝。而普通的士卒，大多只是为稻粱谋。

可以想见，当他们逼近这座近百年的旧都，心中的欲望是怎样如熊熊烈火的！平城的城墙固然坚固，故都的城门固然牢实，但高墙壁垒挡不住绝望之后的愤怒。

城破之时，一群一伙的兵士，拥着挤着，涌进城里，那些高大的官殿是他们的主要目标，那些高宅大院是他们前进的方向。一时之间，喧嚣呐喊的，破门拆墙的，放火烧屋的，肆意抢掠的，充

斥在平城官城、皇城以及外城各处。天文殿、天安殿、天华殿、永安殿、紫极殿，这一座座经过几年、几十年打造的豪华官殿被毁被拆，或者被一把大火点燃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最终灰飞烟灭。

平城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以来，便开始不断建设，其中天赐三年（406）“发八部人，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，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”。前后经历了道武帝初创，明元、太武两帝改建扩建，加上孝文帝进一步完善，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北方非常繁荣的大都市。据史料记载，平城内官殿众多，有东宫、西宫、南宫、北宫、紫宫、丰宫、寿安宫、崇光宫、永乐宫、永安宫、豺山宫、西苑宫、白登台及天文殿、天华殿、中天殿、紫极殿、昭阳殿、天安殿、太华殿、太和殿、太极殿、鉴元殿、经武殿、思义殿、安昌殿等。官殿之外，还有一些园、池、楼、阁，分布在平城内外。

“恒代而北，尽为丘墟。”一个曾经辉煌了近百年的都城，几乎变成了一座废墟；一座曾经号称百万人口的国际都市，变成了万千人欲望的牺牲品。此后很长时间，平城风采不再。



山村寂静雪微声(油画)

白晋作

近日在“文博山西”读到王芳老师《华严寺：大辽国的星火与梦想》节选，作为大同本地人，我深受触动。她以文学之笔写历史之重，让一座古寺与一座边城的千年命运，在文字中重新苏醒。

大雄在此：北国草原的磅礴气度

1933年9月，梁思成与刘敦桢、林徽因等人走进大同华严寺，尽管之前已在书中看到过华严寺的局部照片，然而在现场见到它的全貌，一行人还是忍不住“同声惊讶，叹为巨构”。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，华严寺如一枚被尘埃掩盖的钥匙，即将打开中国建筑史中失落的一页。

梁思成后来在《中国建筑史》中强调：“辽代建筑实为唐宋间之过渡，其手法多存唐风，而又开金元之先河。”华严寺正是这一论断最坚实的证据。

走进华严寺，最直接的感受是一种语言难以尽述的“雄壮”。这雄壮首先体现在建筑的尺度上——大雄宝殿作为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，建筑面积1559平方米，面阔九间，进深五间，屋脊琉璃鸱吻高达4.5米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奔放雄健的审美趣味。

这种对宏大体量的追求，源自游牧民族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传统。他们长期生活在广袤草原，自然形成了崇尚开阔、宏伟的审美观。当他们开始建造固定建筑时，便不自觉地将对这种审美转化为建筑语言。

华严寺坐西朝东的格局，更是一个深具意味的文化符号。《新五代史》记载：“契丹好鬼而贵日，每月朔旦，东向而拜日。其大会聚、视国事，皆以东向为尊。”这不仅是习俗，更是一种宇宙观的体现。当晨光穿过门扉，依次照亮殿内佛像时，整个空间便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。

建筑的细部处理同样彰显北方特色。斗拱用材粗壮，出檐深远有力，屋脊曲线刚健，与江南建筑的纤巧秀丽形成鲜明对比。殿内佛像庄严雄伟，配合

华严寺与一座边城的千年咏叹

——读王芳《华严寺：大辽国的星火与梦想》有感

董晓纲

宏大空间，确实能产生王芳所说的“压迫感”，让人“沉下心来，礼拜禅修、忏悔自己在尘世中的妄念”。

匠心独具：木构艺术的巅峰之作

薄伽教藏殿的梁架结构，堪称辽代木构的典范。其结构逻辑清晰严谨：“上是脊榑下接大叉手，中有蜀柱，叉手下是平梁，平梁下是四椽草椽，草椽下是四椽明枋。”这套体系科学地分散了屋顶重量，展现了古代工匠对木材性能的深刻洞察。
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柱头卷杀为四瓣，与唐代常见的五瓣做法不同。这种细微变化，正是辽代建筑在继承中创新的明证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的，是殿内四壁环列的38间重楼式木构藏经阁。它们构建出一个微缩的佛国世界，每一间都是完整的建筑模型，斗拱、门窗、屋顶一应俱全。尤其是殿后明窗处的圆拱拱桥与5间“天宫楼阁”，其设计之巧、制作之精，堪称辽代木构的巅峰。梁思成称之为“海内孤品”，实不为过。

值得铭记的是，这些精美木作都出自无名工匠之手。他们或许从未想过，他们的作品跨越千年，依然在向世人展示着辽代工艺的辉煌。他们以斧凿雕琢的，不仅是一根根木材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。

千年悲情：火与重生的轮回

华严寺的千年历史，是一部浸透血泪的损毁与重修史。1122年，金兵攻陷辽西京大同，“殿堂栋宇，楼阁寺观都烧起来了，火焰与彤云争辉，经久不息

……‘俄而灰之’。”王芳在书中描绘的这一幕，虽只寥寥数语，却道尽战争的野蛮与文明的脆弱。

然而，薄伽教藏殿竟在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，如同一粒珍贵的火种，等待复苏的时机。金天眷三年（1140）夏，慈济、通利、义善、德祥等大帅立于华严寺废墟之上，发出流传千古的慨叹：“痛乎哉，惜乎哉。为人之后者，苟不能继其绝而兴其废，补已弊而完已隳者，能无愧乎？”这番话体现了一种深沉的文化传承自觉。

修复进行得异常艰难。几位大师“自己捐出所有，加上信众们的捐助”，才勉强开工。可惜工程浩大，没等完成，他们就先后离世。最终由弟子接续完成重修，留下现存的大雄宝殿。

此后华严寺的命运，始终与王朝兴衰紧密相连。元初，慧明和尚所见已是“院门冷落，庭宇荒凉”；明初，华严寺大殿被当作仓库使用；清初“大同之屠”中，华严寺再次“倒塌损毁，不忍目睹”。

从了然和尚“手摇木铃”艰苦结缘，到化愚、成禄师徒执着奔走，再到清末空明和尚三年摇铃募捐，这些僧人的名字或许在正史中微不足道，但正是他们，用一生坚守维系文明火种。直至2008年大规模重修，华严寺的历史，就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生动写照。

边城大同：民族融合的熔炉

华严寺的千年沧桑，必须放在大同这座独特城市的历史地理背景中才能深刻理解。大同的地理位置，早已注定了它的历

史命运。地处阴山脚下，位于吕梁、太行与黄河围合的山西高原的“小缺口”，这里既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，也是中国古代表等雨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样的地理禀赋，注定了它“战场、丝路、重镇、长城的一部分”的多重身份。

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到拓跋珪定都于此开启北魏百年辉煌，再到石敬瑭献出幽云十六州，使大同成为辽金两朝的西京，这座城市始终扮演着民族融合“熔炉”的关键角色。

“大同”之名，其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始终是人们的终极梦想，也恰是对其历史使命的最佳注解。华严寺的存在，正是这种“大同”理想的物质载体。它的建筑，融合唐风、辽韵与汉式技艺；它的宗教，是契丹皇族吸收汉地佛教并加以尊崇的结果；它所珍藏的《契丹藏》，更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结晶。

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宏观历史进程中，更表现在具体文化细节里。华严寺内的佛教造像极具代表性：既有唐代的丰腴典雅，又带草原民族的刚健质朴；既遵循佛教造像仪轨，又融入契丹人的审美趣味。尤其是那尊合掌露齿菩萨，其微笑中既有佛家慈悲，又带草原少女的率真，正是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。

王芳精辟指出：“不论是五胡乱华还是五代十国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……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中原被注入了豪爽健壮的新鲜血液，而野蛮状态的游牧文化也注入了儒家的礼仪传统和精神实质。”大同，正是这场持续千年融合的“主战场”。而华严寺，就是这座熔炉中锤炼出的最灿烂的文化结晶。

明人韩雍七律《游云中下寺》赏析

韩府

近十多年来，笔者一直致力于寻觅有关大同的古诗词，以丰富大同的文化内容，增加大同的文化分量，提升大同的文化品位。然而，有关大同华严寺的诗词却只见过寥寥几首，并且其中像清人冯云骧的《游华严寺》，其实并不能遽然就认为是写上下华严寺的，因为也可能是写东关南园的华严寺的。近来突然发现了明代重臣韩雍的七律《游云中下寺》，可说是大喜过望，那心情真不啻发现了什么宝藏或者中了大奖。下面先欣赏原作：

游云中下寺
明·韩雍

边庭无事简书稀，偶到僧房暂息机。残雪江山惊岁暮，红尘踪迹与心违。且倾尊酒消愁闷，莫向群公论是非。自古忠臣报明主，只将三尺播皇威。

要了解这首诗，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诗的作者。韩雍（1422—1478），字永熙，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。明朝中期名臣、诗人。于明英宗正统七年（1442）登进士第。初授御史，出巡河道，后巡抚江西。明代宗时累擢右金都御史、巡抚江西，以弹劾宁王获罪，被勒令致仕。天顺年间复官，历官大理寺少卿、兵部右侍郎，巡抚大同、宣府，本诗即作于这一期间。明宪宗成化元年（1465），以右金都御史之职前往平大藤峡起义，俘杀首领侯大苟，截断江上大藤，改地名断藤峡。平乱后以左副都御史之职提督两广军务。成化十年（1474），韩雍受人诬陷，再次被勒令致仕，成化十四年（1478）病逝。明武宗时追谥“襄毅”，故后世称其为“韩襄毅”。有《襄毅文集》15卷传世，收于《四库全书》。后人评价，韩公做文章不屑于雕琢绘句，故而时现慷慨磊落之英气，与当时盛行的“台阁体”有很大不同，被认为“虽未变体裁，而特饶风骨”；其杂文亦“高视阔步，气象迥殊”，有雄浑磅礴之气。

《游云中下寺》是一首七律，这里的“云中”是大同的古称，“下寺”则是大同人对下华严寺的俗称。

首联，“边庭无事简书稀，偶到僧房暂息机。”意思是说因为边疆安靖无事，烽烟不起，所以往来公文稀少，于是就得闲到清静的僧寺里暂作放松。“边庭”的意思是边地、边疆一带，指的就是作者驻守的大同。宋人有词，“朝野多欢，边庭初静，歌舞方腾沸。良宵好景，异时多少遗事。”“简书”是古代用于告诫、策命、盟誓、征召等事的文书，此诗中泛指一切往来公文。“僧房”是出家人所居之处，指寺院。本诗的核心词是“息机”，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，意

思为息灭机心。佛教有这个名词及概念，如《楞严经》中有“息机归寂然，诸幻成无性”。道教亦有相近的“忘机”等概念。唐人杜甫有诗，“侧身天地更怀古，回首风尘甘息机。”古人所说的“机心”是指巧诈诡变的心。而“机”则指的是事情变化的枢纽，或有重要关系的环节，想一想那些常见词如枢机、事机、生机、转机、机等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词。最能说明这个概念的古人著作是《庄子》，书中写了这样一则寓言：子贡南游于楚，反于晋，过汉阴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，凿隧而入井，抱瓮而出灌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。子贡曰：“有械于此，一旦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见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”为圃者仰而视之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凿木为机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抽，数如决汤，其名为槲。”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“吾闻之吾师，有机心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，则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”子贡喟然叹，俯而不对。中国人历来都认为寺院里的出家人最清闲，唐代诗人李涉就在诗中道：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宋代诗人石象之也在诗中说：“我见老僧无一事”。元僧石屋清辨禅师有首《闲咏》中说，“竟利奔名何足夸，清闲独许野僧家。”因而，成天忙于边疆军务的作者也是到同城里的下华严寺来“息机”偷闲了。

颔联，“残雪江山惊岁暮，红尘踪迹与心违。”因为看见寺院角落中的残雪，猛然想到时间又到了一年的终了；诗人说自己在红尘尘世中所做过的一切事情，其实与自己的本心是相违背的。“红尘”的意思是繁华的社会，泛指人间。唐人有诗，“相逢红尘内，高揖黄金鞭。”“踪迹”指诗人走过的痕迹，此处代指人的一切言行。

颈联，“且倾尊酒消愁闷，莫向群公论是非。”是说眼下先把杯中的酒喝下以消遣愁闷，不再和身边的那些人争辩什么是非短长。“群公”一词泛指诸有名位者，亦用作一般的尊称，即诸公。

末尾，“自古忠臣报明主，只将三尺播皇威。”尽管作者开篇即表示自己已“息机”，但此时想的依然是报效皇恩，建功立业。诗中说，自古都是忠臣报答明主之恩，我现在所能做的也是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把皇威威传播到边塞。所谓的“三尺”指剑，是由“三尺剑”简化而来。《汉书》记载高皇帝自己就说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”。从表面上看，作者自己似乎是前后自相矛盾的，但要清楚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一位臣子来说，忠君与爱国是密不可分的，而要“播皇威”其实也等同于宣示国威。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jygang@126.com

重要依据。她还详细描述薄伽教藏殿内壁藏经阁的构造：38间重楼式木构，精巧绝伦的天宫楼阁，这些不仅体现辽代工匠的高超技艺，更反映华严宗“重重无尽”的宇宙观。

值得一提的是王芳对《契丹藏》的考证。这部由辽兴宗下令编刻、历时30多年完成的大藏经，曾庄严供奉在薄伽教藏殿的天宫楼阁内。虽然原版经卷大多散佚，但通过1974年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秘藏，我们仍可窥见其风貌。王芳通过这些细节串联，让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。

星火不灭：文明传承的永恒见证

站在今日华严广场，仰望那座依照薄伽教藏殿天宫楼阁放大而建的仿古建筑，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精神跋涉。华严寺的存在，已超越宗教建筑范畴，成为中华文明顽强生命力的一个象征。

那方“调御丈夫”匾额，不仅是对佛的尊称，更承载着明代总兵马林一家的忠烈故事。马林出身将门，父亲马芳曾在北疆与俺答作战，《明史》称其“威名震边陲，为一时将帅冠”。马林本人爱好书画，擅长书法，最终在萨尔浒之战中捐躯，几个儿子也都战死沙场。这块匾额因而成为家国命运的见证，那苍劲笔触间，仿佛还流淌着忠烈们的热血。

合掌露齿菩萨的微笑，历经千年依然动人。这微笑能穿越时空打动今天的我们，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对美与善的永恒追求。在那个政权更迭、战乱频仍的年代，艺术家依然能保持对美的执着，用泥土塑造出如此动人的形象，这本身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。

华严寺的千年历程告诉我们：文明的传承从来不是帆风顺的，它需要在一次次劫难中涅槃重生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永不倒下，而是在每一次倒下后，都能重新站起，并且站得更加挺拔。